

論美國亞洲政策

鄧公玄

一 美國與亞洲

一九四九年冬天，那時我們政府剛剛由大陸遷避來台，美國參議員史巴克曼先生來台訪問，作者和立法院外交委員會若干人在中山堂招待他，同時非正式交換意見。當時我們問他：美國爲什麼採取「歐洲第一」政策？他說：美國距離歐洲比較亞洲近，同時美國人又多來自歐洲，故無論地理上或心理上，美國和歐洲的關係都較密切。而且從美國的安全來說，歐洲也較亞洲爲重要，所以自然產生「歐洲第一」的觀念。

史巴克曼先生的答案，我相信是很坦率真誠的，也足以代表美國多數人的心理。但是我認爲他的話充其量只合於二次大戰以前的情形，而且我相信若在今天，恐怕史巴克曼先生也將加以修正了。

美國在地理上雖然距歐洲較近，去亞洲遠，但從美國內政和外交的路線來看，美國自始就是從東向西發展的，質言之，也就是一天一天的走向遠東和亞洲方面。美國在獨立的時候（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一共只有沿大西洋海岸的十三州，然而美國移民不斷由東而西，卒至遠達太平洋海岸。迨至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以後，美國先後佔領了菲律賓、夏威夷、波多黎各及關島等地，事實上已成爲太平洋的強國。所以早在六七十年以前，美國與亞洲的關係就較歐洲爲更密切而不可分割了。但美國人士在心理上，却依然由留戀而錯覺。

二 門羅主義到孤立主義

美國今天當然是世界的超級強國，對目前許多新興國家而言，無疑也是

先進國家。可是美國的歷史還不到二百年，對歐、亞許多先進國家而言，又無疑的還是新進國家。由於這一事實，所以美國的對外政策始終不免有獨善其身的傾向。華盛頓總統在其臨別告國民書中，即警告美國人勿與他國發生牽連，因爲他知道新興的美國，只有在超然而自在的情況下，才能順利發展。

到了一八二三年，門羅總統（James Monroe）在其致國會咨文中，乃正式提出了下列兩項重要原則：其一爲反對歐洲殖民主義繼續在美洲蔓延；其二爲反對歐洲國家對美洲事務的干涉。由此遂引伸而成爲「美洲爲美洲人的美洲」的說法，再引伸而爲美洲亦不過問歐洲事務的孤立主義。百餘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即始終未能擺脫此種「門羅主義」的窠臼。

但是由於世界形勢的推移，尤其由於美國自身不斷的發展，事實上早已使門羅主義成爲時代的錯誤，可是美國外交政策却依然留戀於孤立的幻想中。在第一次世界戰爭之時，美國會盡量避免捲入漩渦，但結果則被迫參戰；參戰以後，威爾遜總統企圖放棄孤立主義，可是他所提出的國際聯盟計劃以及簽訂的凡爾賽和約，則慘遭參議院的否決，使美國依然回復到孤立主義。第二次世界戰爭時，美國同樣想避免參戰，但因珍珠港事變，而再度捲入。這次參戰使美國人的心理當然有相當的改變，而以羅斯福總統的聯合國計劃未受美國人的反對而卒能建立起來。

美國設計建立聯合國，承擔了對世界和平的重任，其孤立主義應該是被揚棄了。然而自從東西冷戰發生以後，美國採取的「防堵政策」，照我看來，這依然還是門羅主義的運用，不過範圍擴大了而已。以前的門羅主義僅僅適用於美洲，今天則適用於整個非共產世界。以前的門羅主義是以與歐洲隔離

為目標，現在則逐漸擴大而要求與共產世界相隔離。以前美國希望歐洲不干涉美洲，美洲也不過問歐洲；今天則只要求共產國家不再向外擴張或滲透顛覆，則美國將與共和共存。這不是門羅主義的幽靈復顯是什麼？

杜勒斯在一九五二年間為艾森豪制訂外交方針時，曾提出所謂「解放政策」的口號，當時頗博得一片采聲，但是這種所謂「解放政策」，不久就被束之高閣。為什麼？因為在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蘇俄提出了「和平共存」的謊言，使美國人心中所憧憬的幻想，已若隱若顯的由敵人口中表露出來。現在美國在越南作戰已經好幾年了，依然和韓戰時期一樣，還是把自家的手足縛扎起來，不能放膽去爭取勝利，大家都感到惶惑，不知道美國何以如此怯懦。可是如果把上述的背景加以回味，則不難立刻恍然大悟。實言之，就是因為美國政策迄未脫離門羅主義的基本意義，而其最高要求不過在使共產國家放棄向外擴張，至於他門瓦上的霜雪，當然不願去掃除的，所以惟有墨守消極的自縛政策。

三 門戶開放政策

我們在前面曾指出美國的傳統外交政策是以門羅主義的孤立觀念為基調，同時我們也指出美國的發展路線，則是由東向西的，故在美、西戰爭以後，美國即已成為太平洋方面的強國。所以美國對亞洲方面不但並非以孤立姿態出現，而且往往採取干預政策。美國於一八四四年和中國訂立望夏條約（Wanghia Treaty）之後，又因美國海軍提督皮里（Commodore M.C. Perry）的遠征，於一八五四年打開了日本鎖國主義的門戶。尤其是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所提出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 Policy）。正如婁祺（Charles O. Lerche Jr.）在其所著「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第四編第七章所指出，「美國的所謂孤立主義的原則僅與歐洲有關」。至於在亞洲方面，美國則早已採取「干涉」政策。

何謂「門戶開放政策」？依照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一八九九年九月訓令美國駐英、德、俄三國大使向各該國提出的三項原則如下：①各國在中國所獲得之勢力範圍或租借地，以及通商口岸之投資事業，彼此不得干涉。②各國勢力範圍內各港口，無論對於何國商品，皆遵守中國現行海關稅率賦課（自由港不在此例），其稅款由中國政府徵收。③各國勢力範圍內

各港口，對於各國進港船舶，不課本國以上之進港稅。各國勢力範圍各鐵路，對於他國貨物，不收超過本國以上運輸費。同年十一月，美國又訓令駐法、意大使，以同樣通牒致送各該國。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海約翰乃正式發表聲明，宣佈門戶開放政策已為列強共同對華政策。

當海約翰宣佈此項政策時，正是我國義和團肇亂的時候，因而引起八國聯軍之役。海約翰乃更於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致送第二次通牒，特別強調維持「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然而因八國聯軍攻破北京，次年簽訂辛丑和約，美國所期望的門戶開放政策並未為各國所尊重，其後日本因見俄國對滿洲加強侵略，曾試探美國是否願以武力實施其所宣佈之原則時，而海約翰則婉却之。依肯南（George Kennan）的追述，所謂門戶開放係由美國提出，但海約翰本人並不了解其實際的意義，他說：

「這或許是代表中國海關因鑑於若干足以威脅其前途發展的期望。這不是新政策而是一種舊觀念。這不是美國政策而是英國早已建立的對華政策。……這一政策，美國人也沒有決心去支持，而且如果實行起來，對其結果如何，美國也沒有準備接受特別的責任。其後不久，由於事實所表現，我們自家也不願把這一政策實施於我國領土以內，蓋在我們取得菲律賓與波多黎各數年之後，——即違反了我們勇敢的承諾——我們在這些新取得的領土內採用差別待遇，恰與門戶開放政策相衝突。」（Georg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P. 40）

事實上，恐怕美國當時誠如肯南所說，其所倡門戶開放的原則只是一時心血來，並無決心予以實施的。但是我們應該感謝美國，因為對當時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無疑的發生了相當阻擋作用。而且也因為此一觀念，所以美國才能首先退還庚子賠款作為我們派遣留學生的費用，逐漸建立中美間的深厚友誼。

四 史汀生主義與雅爾達密約

美國在門戶開放政策裏面，雖然提出了維持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的原則，但美國固未嘗以實力加以實施。日俄戰爭後，日本取代俄帝在滿洲的特殊地位，美國亦莫可如何。迄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向中日兩國致送備忘錄，聲明對日

本以武力造成的任何變動，美國概不承認，而成所謂史汀生主義。其備忘錄中有云：

「美國政府不能承認任何事實上之情勢為合法，凡中日兩國政府或其代表訂立之任何條約協定，足以損及美國或其人民在華條約上之權利；或損及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之完整，或違反國際間關於中國之政策，即通常所謂門戶開放者，美國政府無意承認。……」

美國的不承認主義固然對日本具有阻嚇的意味，但這只是消極的聲明，日本軍閥並未因此而有所顧忌。而且日本對美國備忘錄的答復中說：「日本將盡力維持滿洲門戶開放政策，與在中國本部無異……」日本的答復雖明明為詭辯，然美國固亦無以難之。

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我國實行對日焦土抗戰，在最初時期，美國雖亦同情我國，然而除消極的不承認主義而外，亦無甚積極的援助，雖然在一九三八年底也曾有對日本採取經濟制裁的某些措施。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發生，美國被迫參戰後，才放手與我合作。當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國舉行開羅會議時，羅斯福總統對亞洲問題，似乎也尊重蔣總統的意見，對戰後亞洲頗有將安定重心放在中國的打算。這種明智的方針如果維持下去，則今日的亞洲與世界應該是非常光明的。

可是好景不常，正當美國對亞洲政策走向光明途徑之時，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即開始離間中美友好關係，對國民政府極盡詆毀中傷的能事，以致發生許多誤會與隔閡。而尤其不幸的，就是一九四五年二月間雅爾達密約的簽定。當時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會議于雅爾達島上，其主題原為討論對戰後歐洲問題的安排，本不應涉及遠東，而且我國又未參加，更不應對中國問題有所牽連。然而他們除發表雅爾達聲明外，並簽訂一項密約，其內容要點為：

「蘇俄於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以後，兩個月或三個月內，參加對日戰爭，其參戰條件如下：

甲、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應予維持。

乙、一九〇四年俄國被日本所破壞的權利，應予恢復：1.庫頁島南部與其鄰近島嶼應歸還蘇俄。2.大連商港應予以國際化，蘇俄在該港的優先利益，應予以保障。3.旅順軍港應租與蘇俄。4.中東鐵路與南滿鐵路，應由中俄合

組公司經營；中國保有滿洲的整個主權，蘇俄的優先利益，亦應予以保障。

丙、千島羣島應割讓予蘇俄。」

上述有關中國部分的密約，由羅斯福保證徵取中國同意，而史達林則保證與中國締結友好同盟條約。此項密約直至羅斯福逝世後，亦即在德國投降後，始由美國通知中國。我國當時為環境所迫，不能不與蘇俄簽訂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由此，便把戰後中國大陸的命運註定了。

羅斯福總統原是對中國非常友好的，為什麼他要犧牲中國重大權益以博取史達林的歡心呢？據說是因為他亟亟於取得對日本戰爭的勝利，故不能不要求蘇俄出兵遠東。但是他為什麼亟亟於求得對日戰爭的勝利？據說因為他當時已深感體力不支，而當時美國的原子彈尚無製成的把握，所以希望蘇俄出兵遠東，以期得及身親見大業之完成。然而也有人以為這是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陰謀，羅斯福只是上當而已。

雅爾達密約的簽定固然是空前的大錯，假使美國在戰後而能覺悟其錯誤，對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陰謀提高警覺，對中國戰後局勢能够把握正確方針，不為謠言所移，則我雖喪失了外蒙和滿洲的權益，依然可以避免今天的慘劇。不料美國對中國政治竟堅持其組織國、共聯合政府的企圖，使國民政府喪失劃平共匪，統一中國的時機，迄整個大陸淪陷，美國竟欲以一紙白皮書洗刷其錯誤。中國大陸淪陷之後，美國態度殊為游移。其所以未墮入陷阱者，蓋因共匪立刻關閉門戶，仇視美國，使美國不能不等待「塵埃落定」（美國務卿艾其遜的名語）而已。

五 防堵政策在亞洲的考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蘇成爲爭霸世界的兩個超級強國，發生所謂東西冷戰。美國之認識此種事實，蓋起源於一九四七年三月間的杜魯門主義；其在蘇俄方面，則遠在雅爾達會議時，即已擬定了藍圖。

蘇俄赤化世界的陰謀，是同時向東、西、南三方面並進的，但美國最初只注意歐洲與中近東的危機，對於蘇俄與共匪在中國大陸方面的陰謀，絕未加以警覺。所以美國採取「歐洲第一主義」，而實施其「防堵政策」。迨至中國大陸於一九四九年淪陷的時候，美國仍未改變其歐洲第一的觀念，直至一

九五〇年六月，蘇俄使北韓進攻南韓，才迫使美國不能不正視亞洲問題，並將其防堵政策移到亞洲方面。但是由於美國過於保守，雖然在韓國死傷十餘萬眾，而其結果僅維持北緯三八度的陣線。

正因爲當時錯過了對蘇俄與中共匪幫的膺懲機會，所以自一九五三年以後，蘇俄得在和平共存的烟幕下進行軍備擴充，發展飛彈，在一九四七年十月，首先發射兩顆地球衛星，於是黑魯曉夫乃利用飛彈向西方進行敲詐。而共匪則對美國發生輕蔑觀念，指其爲紙老虎，並向大陸邊緣進行滲透與顛覆的陰謀。由於美國既在亞洲實施防堵政策，故共黨侵略越南的戰禍發生，美國爲履行其對越南的保證，遂不能不挺身參加越南戰爭。然而數年以來，美國深深陷於越南叢林荆棘之中，欲罷不能，欲和不得，朝野上下莫不徬徨迷惘，不知如何自拔。

論者謂美國對越南戰爭是採取「不求勝利的政策」(No Win Policy)，但我認爲乃是「不能勝利的政策」，其所以不能勝利，則是由「防堵政策」的先天性而決定的。蓋既云防堵，則無疑的係消極的，故祇希望保持越南北緯十七度以南的安全，既不敢攻擊北越，更不能對幕後的共匪發生任何創傷。

美國之所以如此，顯然是任於韓戰的驗經而然，然而事實上越戰與韓戰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因爲北韓是正規軍和美軍作戰，而共匪也是以大批志願軍投入，故美國可以火海制勝入海；今天北越係以游擊隊滲透南越，而共匪又未直接介入，美國怎樣可以運用韓戰的方式迫使北越和共匪就範呢？所以美國想要沿用韓戰方式以爭取越戰的勝利，顯然不可能的。

六 美國對亞洲政策觀念的紛歧

在韓戰時期，美國對亞洲採取普遍防堵的措施，幾乎是朝野一致的主張，然而對今天的越戰，則羣言亂雜。關於越戰方面，至少有三大派意見。第一派是鴿子派的主張，所有自由主義者，共黨同路人，皆認爲東南亞並無重大的利害關係，美國不應捲入越南的叢林戰爭。自共匪先後三次核子試爆以後，他們又強調共匪的可怕性，主張迅速與共黨和談，或者自動撤退。像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曼斯斐德，參議員莫斯，羅伯·甘迺迪，以及作家李普曼等，皆其著者。

第二派可稱之爲鴛鴦派。這些人士雖不主張自越南完全撤退，但他們反對增加對越戰的包袱。例如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原是防堵政策的原始設計人，他在參院外委會作證時，即主張限制美國在越南作戰的目標，美國應牢牢守若干地區，以待解決之來臨。又如退伍軍人蓋文將軍(Gavin)在哈普雜誌發表主張，也認爲美國應將其軍隊集中於沿海某些地區，運用優越的海空軍予以固守，進行與北越和談。他說擴大轟炸，甚至擴大到河內以至北平，均無濟於事。至於美國增加軍隊，則其勢必致引誘共匪介入，而韓戰亦有重啓的危機。

第三派則是所謂老鷹派。這派人士深知美國與亞洲的命運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越南失守，則整個東南亞即立刻不免遭受同一惡運。故美國應履行其對越南的諾言，切勿畏懼共匪介入而自撤藩籬。但他們雖主張美國應維持對越南的承諾，但亦非主張擴大戰爭或進攻北越。同時他們雖痛惡共匪，然而也不主張對共匪採取膺懲的行動。美國共和黨人士大都如此主張，例如上兩屆總統候選人尼克森、高華德皆是。至於民主黨人士如參議員羅素、陶德、薛明敦亦然。此外美國軍人方面，大多數皆屬老鷹派，例如軍事分析家強生(Max G. Johnson)、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E. G. Wheeler)等皆有堅決而明顯的主張，且強調擴大越戰以爭取勝利。

由於美國對越戰意見的莫衷一是，於是左傾人士在去年底與今年初，遂發動大規模的反越戰運動與「強教」運動。而今年二三月間，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乃利用時機，邀請美國許多所謂中國問題專家，舉行大規模的作證，以期藉此壓迫詹森總統。傅氏所邀請者大抵皆是自由主義者或左傾人士，其理論往往傾向姑息，對越戰固持反對立場，而對共匪則主張聽其加入聯合國，甚至應予以合法的承認。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厥爲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納特(A. Doak Barnett)的謬論，因爲他提出了一個古怪的新口號，亦即所謂「防堵而不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Isolation)的政策。

何謂「防堵而不孤立」的政策？據巴納特於本年三月八日在參院外委會作證時說：

「我深信時代業已到來——雖然美國現在正在越南進行一項劇烈的戰鬥——我們政府應改變其對中共的態度，採取一種防堵而不孤立的政策，這一政

策的目的，一方面在制止由北平所發動的軍事冒險與顛覆威脅，而另一方面在於與中共有最多的接觸並使其對國際社會有更多的參加。這樣的政策將包含着繼續支持對共產國家抵抗共黨的顛覆與叛亂，例如越南，同時又繼續對中國大陸邊緣地區的防衛，包括台灣在內。但是這將含有許多其他方面的政策改變。在我們保證繼續履行我們對台灣抵抗侵略時，我們應明白而清楚的承認中共為中國大陸的事實政府，並且表明我們願意對北平予以法律上的承認，如其表示準備作同樣的交換。

「其在聯合國內，我們應努力並接受某種方式，使中共與中華民國均享其席次……」

巴納特所謂「防堵而不孤立」的謬說，還不止於此，然而這已可概見其要點了。此項口號提出之後，已發生相當的衝擊，即美國的副總統韓福瑞也會引以為言，我們殊未可等閒置之。

七 由檀島宣言到「亞洲主義」

正當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進行大規模作證時，詹森總統為對抗傅爾布萊特的攻勢起見，亦於二月七日至九日，偕其重要閣員魯斯克、麥納瑪拉等飛往檀香山，與越南元首阮文紹、總理阮高祺等舉行會談，除交換意見外，並發表「檀島宣言」，及聯合公報，將美國在越南作戰的目標與方式明白昭告於世。檀島宣言不但對越南戰爭極關重要，即與美國對亞洲政策而言，亦不啻開一新紀元。

檀島宣言的要點如下：

越南政府堅決表示對從事於四方面的鬥爭：①擊敗越共；②建設社會；③穩定經濟；④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

美國政府保證協助越南：一面戰鬥，一面建設；並將聯合他國共建東南亞和平。

雙方共同承諾：美國總統與越南元首及總理，因此再度保證：①阻止侵略；②促進社會改革工作；③達成自治目標；④致力消滅飢餓、愚昧、疾病；⑤堅持謀致和平。

這就是所謂兩面作戰方案，這一新案和以前的政策有何不同呢？簡言之，在軍事上，除了加強在越南的剿共軍事行動外，對北越的轟炸或將擴大，

但進攻北越則尚非其所許。從純軍事觀點言，殊無重大改變。其所不同者，乃在着重於越南境內的各種建設，以期一面以軍事肅清越共，一面穩定收復地區，以斷絕越共滲透與煽惑之路。美國認為經數年努力，可在不擴大戰爭的情形下，實現越南獨立與安全的目的。

美國為執行檀島會議的決定，會派副總統韓福瑞前往越南，共商進行，同時順道轉往泰、澳、菲、印（度）、巴、日、韓等處訪問，以表達美國的新作法，希望獲得合作，以貫徹其目的，自時厥後，美國政府雖仍遭受國內外姑息主義的壓力，但詹森及其重要幕僚固已釐定了堅定的新立場，於是美國一面不斷增加軍隊，擴大轟炸，而一面又加緊越南內部的建設，同時又開始邁向民主的道路。

在檀島會議之後，美國不但對越戰釐定了新的方案，即對整個亞洲問題也開始製定新的藍圖。這一藍圖為何？即所謂詹森主義或「亞洲主義」是已。

「亞洲主義」的要旨——美國對亞洲政策的新觀念，在檀島宣言中雖已開始孕育，但正式成為清晰政策，則見之於今年七月十二日，詹森總統向美國各大學校友會理事會所發表的演說中。他本人並未提出「亞洲主義」(Asian Doctrine) 這一名詞，但其內容實可稱為「亞洲主義」。他說：

「現在亞洲是人類爭取獨立與秩序以及生存的嚴重戰場。

「這句話之所以為真，因為地球上五分之三的人類皆居住在亞洲。其中有數以億計的人民，每天生活費在二角五分錢以下。而且亞洲共黨依然相信可以武力達到其目標。

「如果亞洲有持久的和平，所有人類皆將蒙受福利。但是如果和平而竟失墜，則我們不論在任何地方的成就皆無安全之可言」。

由此可見詹森總統較以往任何總統皆更能認識亞洲的重要性。他又明白指出美國是「太平洋強國」，而美國亦將永久留在亞洲。關於越南，詹森認為等於是歐洲的希臘，必須在越南阻止共黨擴張，好像二次大戰後，必須在希臘阻止共黨對西歐侵略一樣。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力量好像一面盾牌，在這一面盾牌後面，亞洲國家得以建立區域組織，發展經濟，正如二次大戰西歐各國所為者然。所以美國對亞洲的作為，乃是以太平洋國家的身份，在亞洲履行其職責。

美國參院外交會主席傅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於七月二十二日即予以嚴厲批評，並謂「在這種滋長中的亞洲主義之下，美國行將承擔對所有亞洲非共國家的警察與供應者之義務。」並且他認為詹森此種計劃是不現實的。

不管傅爾布萊特等的反對，美國業已朝着亞洲主義邁進，例如在馬尼拉成立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業已有三十一國參加。其次為「湄貢流域開發計劃」，除有關之泰、寮、柬、越而外，還有其他亞洲國家共同參加。而最近越南制憲議會選舉的順利成功，以及在漢城召開的亞洲與太平洋九國外長會議，亦係受其影響而來。可見亞洲主義實際已經開步走了。

關於對共黨國家的態度一層，詹森總統似乎是採取所謂「堅定而富彈性的政策」。照美國官員的解釋，也就是讓北越與中共去自行選擇。美國對北越表示，如其能放棄侵略，則美國可給與援助，至於對中共匪幫，雖無明白表示，但假使而能改變其深閉固拒的立場，美國亦擬與共和平共存，一如美、蘇間者然。

以上所述就是「亞洲主義」的概要，詹森政府今後對亞洲的政策，殆將依之而發展。

八 為美國亞洲政策進一解

我們把美國對外政策，特別關於亞洲政策，作了簡要陳述之後，我們站在客觀立場，不能不為美國決策人士進一解。

首先，我們知道美國的亞洲政策，自始即與其歐洲政策分道揚鑣。因為美國所倡門戶開放政策，在立場上和門羅主義是互相衝突的。美國所以在亞洲尤其對中國主張門戶開放，不但因為不怕捲入亞洲問題的糾紛，而且也是由於美國利益之所強迫。蓋美國的發展，是由東而西，其命運早與亞洲打成一片。以往如此，現在尤然。但許多美國人士至今仍以為美國與亞洲只是商業與經濟的關係，其安危不能與歐洲相提並論，這種見解是極其謬妄的。現在詹森總統所倡的「亞洲主義」，業已糾正以往的錯覺，值得我們欣慰，我們更希望美國朝野一般人士都能接受詹森總統的看法，加緊邁向此一新的康莊大道。

美國對冷戰採用防堵政策，逐漸把整個非共國家包括在內，固然放棄了孤立的立場，但我認為這依然只是門羅主義的擴大。因為如此，所以美國對冷戰的最高目的，不過是阻止共黨對外擴張，故如共產國家而能放下屠刀，美國即樂意與其和平共存。也因為如此，所以美國對韓戰，對越戰，其作戰目的只求保全固有的防線，不肯越雷池一步，於是令共黨得以享有庇護的屏障，得以從容進行侵略陰謀，而美國則雖疲於奔命，亦不能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因此，美國為自身計，為整個自由世界計，必須把防堵政策作重大的修正，使防堵政策不僅是消極的，而是具有主動的特性。必如此，然後才能在戰場中取勝，才能對共黨發生嚇阻的效力。

美國是民主國家，人民酷好和平，崇尚自由，自然不願戰爭。但是美國必須認識共產黨的本質，即共產國家與自由國家間絕無永久並存之可能，切勿輕信和平共存的謊言。所以不僅美國與共匪之間決無妥協的餘地，即美、蘇之間也絕不能永久相安無事。可是在詹森總統的亞洲主義理面，似乎依然寄望共匪的幡然改悔。至於自康隆報告以來所倡的「兩個中國」謬論，以及巴納特的「防堵而不孤立」的口號，尤其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可怕陷阱，希望美國當局勿上大當。

最後我們不能不一提的，就是亞洲的重心在中國，中國問題如不能有妥善的解決，則亞洲絕無長久安定之可能。但是美國邇來似乎着重於以印度或日本作替代，這是非常危險的。美國固然不願為解放中國大陸而戰爭，但對中華民國在亞洲的重要性與其反攻大陸的計劃，則必須予以嚴重的考慮。尤其我們眼見今天大陸共匪內部混亂，日趨崩潰，實為最有利的時機，美國當局尤不宜輕易予以錯過。

俄羅斯史

呂律譯

俄羅斯史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梭希加廖夫根據俄國古代編年史及其他許多寶貴歷史文獻編著而成，由我國俄國問題專家呂律先生逐譯，不但內容豐富，譯筆流暢，實為我們出版界不可多得之俄國信史，全書三十萬言。平裝定價新台幣五十元，精裝六十元。均特價七折。在學學生及軍人按定價五折優待。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